



王道文化与经济制度

刘遵义 殷寿镛

研究专论第十二号

二零一二年九月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泽祥街十二号郑裕彤楼十三楼

鸣谢



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衷心感谢以下捐助人及机构的慷慨捐赠
对我们的支持 (以英文字母顺序):

捐助人	捐助机构
查懋德	北山堂基金
郑海泉	银联集团
周松岗	国家开发银行
方方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冯国经	东亚银行
胡祖六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刘遵义	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李国宝	
黄桂林	



王道文化与经济制度¹

刘遵义² 与 殷寿镛³⁴

2012年9月

摘要

王道文化是泛指儒家认为君主统治应该施行仁政的思想，而仁政意则是以道德与仁义为基础，来贯彻治国之理念。因此当国家在执政者的带领之下，能够体谅人民，以人民为本，使人民温饱之余，更思考如何教化人民，改变人民的价值观，使人民不再单以自身利益为优先考量，而考量整体的长远利益，这乃是整个儒家经济思想的精神所在。可是在王道文化之下，从生产到消费，都有外部性，单靠市场机制，就不能保证整体经济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率。因此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如同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必须手携手合作才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要推行王道文化，需要从改变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做起。

¹ 本文将出版于刘兆玄与李诚(主编)，《王道文化与公义社会》，台北：中央大学出版中心与远流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12年9月。

²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及史丹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荣休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并不必然反映与作者相关的各机构的观点。

³ 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⁴ 作者感谢李诚教授与刘麦嘉轩女士的评论与鼓励，但所有剩余的错误，仍由作者自己负责。

1. 引言

王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洪范》中，在中华文化里，王道泛指儒家认为君主统治应该施行仁政的思想，而仁政意则是以道德与仁义为基础，来贯彻治国之理念。王道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基本上可以说是实行以德服人的策略。《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 (Plato)，也曾在它的《共和国 (The Republic)》书中，提出「哲者为王」的概念⁵，而这些哲者国王会教化他们的人民，从而推动他们的理想，基本上也可以说是在实行提升文化与道德水平的策略来治国。

儒家强调自我道德修养，且强调道德修养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中庸》也提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所以执政者需要懂得如何修身才能施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上》：「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也强调了仁义之重要性，若义利不分，则恐为暴政之源，所以儒家王道文化之主旨，就是阐明在上位者必须施行仁政。

然而在《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则点明了孔子施政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以民为本：人民能温饱，政府有充足的兵力来捍卫百姓，自然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孔子重视物质民生问题，反观《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从国家的角度来谈利益的问题，却明显地主张仁义应放在第一位，而利益在其后，其差异可能在于孟子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要比孔子所处时代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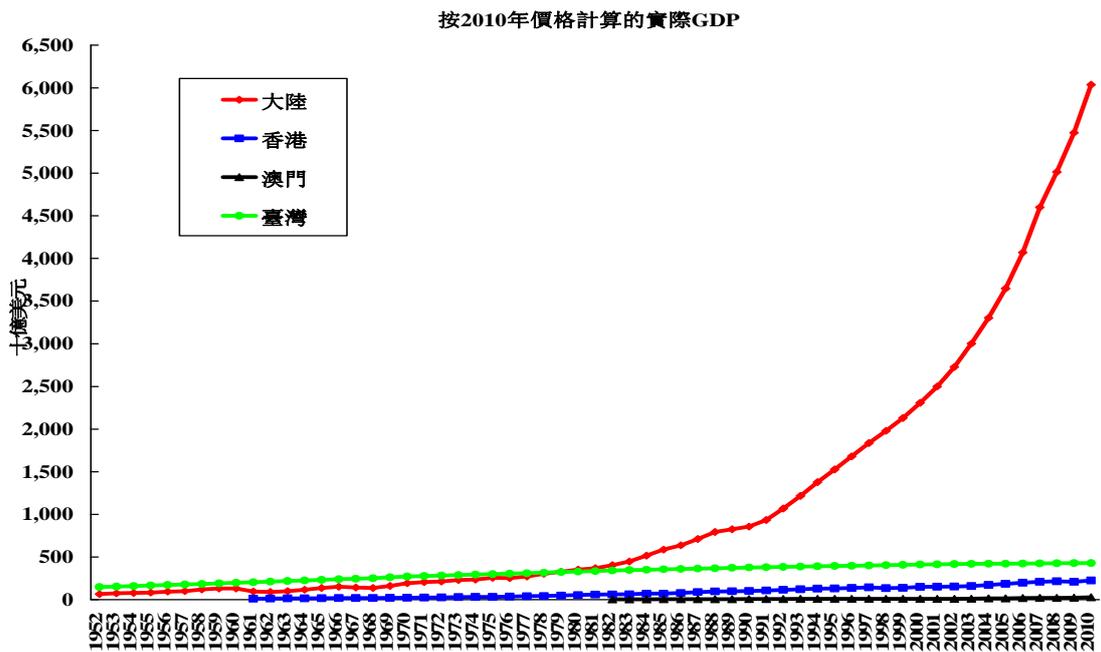
⁵ “Philosophers [must] become kings...or those now called kings [must]...genuinely and adequately philosophize” (Plato, The Republic).

也因此孔子需要更优先考虑人民温饱安全等民生问题。不单是孔子，在更早之前，管仲也说过《管子·牧民》：「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明白地指出了物质生活与礼义道德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富、教以及其优先顺序，即为孔子治国之中心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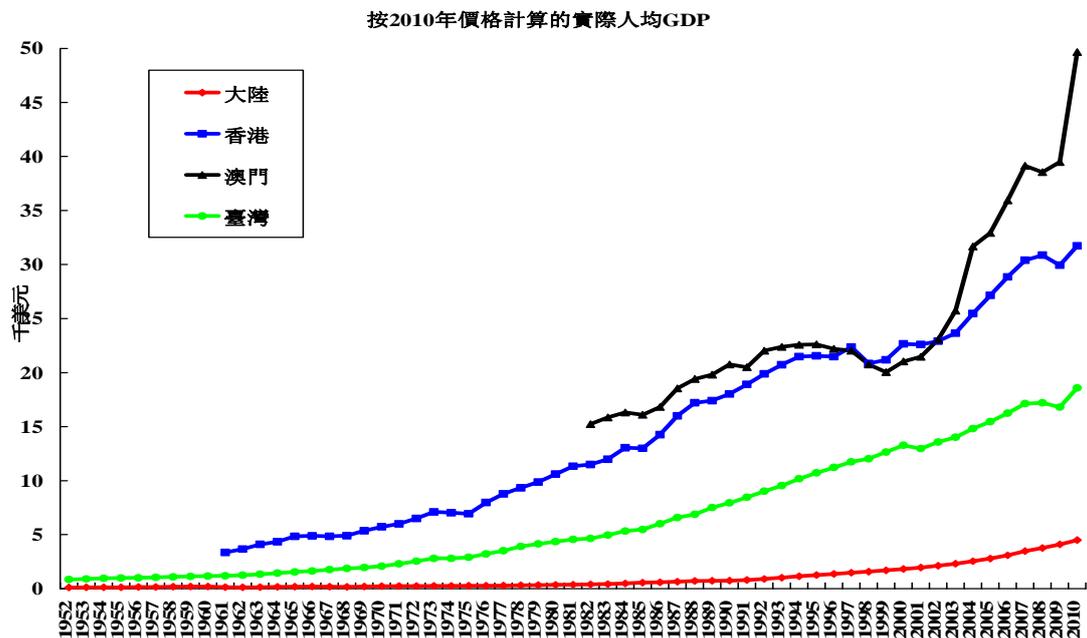
2. 大中华地区两岸四地的经济发展

人民平均所得，是现代经济学用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综观过去 60 年，大中华地区两岸四地，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经济概况，都先后有非常迅速的增长。至 2010 年，中国大陆的境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 6 万亿美元，而台湾与香港的境内生产总值，也都分别达到 4 千 7 百亿与 2 千 2 百 50 亿美元上下。图一分别将过去 60 年的实际生产总值（以 2010 年价格计算）图形呈现，可以发现在中国大陆在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台湾境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幅度，是高于中国大陆的；但相对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境内生产总值在近 30 年有了显著的提升。

图二则分别将四地的人均所得的成长趋势画出，可以发现这四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各个政府的改革与努力下，都呈现了改善，虽然是不同程度的改善。人均所得以澳门为最高，超过了 4 万 9 千美元，甚至超越了美国；其次是香港，超过 3 万 1 千美元；而台湾也达到了 2 万 1 千 7 百美元；在两岸四地中，中国大陆的 4 千 5 百美元人均所得，虽是敬陪末座，但以全球角度而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年所估计的人均所得排名，也在前 100 名中，可以说是小康的水平；而大陆同胞的温饱问题，也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图一



图二

回顾孟子的理论，则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只注重个体或个人私利的倾向，《孟子·梁惠王上》就曾说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在现今无论开发中或已开发的国家，

孟子所云之王道精神，更需要引申为戒，避免凡事都以利益来衡量，都以利为先；在人民基本温饱后，执政者更应当考虑重整与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其实两岸四地都早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时候了。

3. 王道文化的经济内涵

王道文化的经济内涵，基本上也可以以《礼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作为最佳阐述。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摄行相事，三月而大治，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德政，达到大同盛世的境界。这乃是由于孔子教化鲁国人民的成功，而并不是严厉执法的结果。《礼运大同篇》包含了几个重要的基本经济概念，我们在下面一一解释。

3.1 个人利益与集体福利

「天下为公」的意义，就是说：天下不是为一人或一家所拥有，也不是只为一人或一家所服务，所以执政者追求的是集体福利和利益。「讲信修睦」的意义，就是说：讲求诚信，培养社会和谐。要达到社会和谐，也就需要兼顾集体的福利和利益，减少或消除人民内部的矛盾。重点是不单执政者需要谋求集体的福利和利益，一般人民也应当自发性地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

3.2 个人效用函数 (价值观念)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意味着个人不单照顾自己的父母与子女，

也照顾他人的父母与子女。「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也就意味着个人出力，不必只是为自己的利益。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个人的效用函数 (utility function)，不单取决于个人自己与家人的商品(包括休闲 (leisure))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 (vector)，也取决于其他人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论语·颜渊》：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强调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与感受的重要性。

在现代经济学中，个人的效用函数可以写成：

$U = F(X)$ ，其中 U 是个人的效用函数值， $F(\cdot)$ 是效用函数， X 是个人自己与家人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但假如个人的效用函数，也同时取决于其他人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时，个人的效用函数就可以写成：

$U_0 = F(X_0, X_1, X_2, \dots, X_n)$ ，其中 X_0 是0个人自己与家人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 X_i 是 i 个人与家人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 $i=1, \dots, n$ 。0个人的效用也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量，其他个人的效用亦然。0个人对不是家人的其他人，张三、李四或王五，都是一视同仁，所以0个人的效用值应当是独立于其他人的数标 i ，也就是说：

$$\begin{aligned} U_0 &= F(X_0, X_1, X_2, \dots, X_n), \text{ 也等于} \\ &= F(X_0, X_2, X_3, \dots, X_n, X_1); \end{aligned}$$

0个人的效用值不受其他人互相交换他们消费量所影响。其实，0个人的效用函数，除了取决于自己与家人的消费量向量外，也可以只取决于其他人的效用函数值，而不是直接取决于其他人的详细消费量向量，在这种情况下，0个人的效用函数也可以写成：

$U_0 = F(X_0, U_1(X_1), U_2(X_2), \dots, U_n(X_n))$ ，其中 U_i 是 i 个人的效用函数；同时0个人的效用函数，也是独立于数标 i ，就是说：

$$= F(X_0, U_2(X_2), U_3(X_3), \dots, U_n(X_n), U_1(X_1))。$$

0个人的效用函数值会随着其他人效用函数值增加而增加，但无论任何其他人的效用函数值增加，对0个人的效用函数值的影响都会是一样的。

假使个人不是完全自私的，而个人的效用函数也真正取决于其他人的效用函数值或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这就形成所谓外部效应 (externality)；个人的效用函数值，不单取决于自己的行为，也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各自独立寻求自己的效用函数最优化，并不能保证达到整体经济的最高效率或是柏拉图最优 (efficiency or Pareto optimality)。在有外部效应情况下，要达到整体经济最高效率，不能只倚赖市场运作，市场之外的直接协调 (coordination) 是必须的。

例子：有一对夫妇，家境清贫，但非常相爱。先生很喜欢摄影，有一个照相机；夫人有一头美丽的长头发。节日到了，两人都想买礼物送给对方，但都没有钱。先生把照相机卖掉，买了一个梳子，准备送给夫人用来梳她的美丽的长头发。夫人剪了她一头美丽的长头发，卖了给别人，再买了一个镜头，准备送给先生用来摄影。结果是两人都不能使用对方辛辛苦苦买来的礼物，而处境比以前更差。两人的动机都非常好，都是想令对方高兴，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个简单的例子，就说明了在有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协调是何其重要。

当一个社会中个人作决策时，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也会受其他人的行为所影响，这个人的行为就会产生外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每个人都追求个人效用极大化，但缺乏协调，也不能保证整体经济达到最高的效率。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也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概念：首先，超富足 (super-abundance) 的物质经济水平还未达到，所以仍然需要珍惜资源，不能让财货随便丢弃于地上。其次，即是如此，也不必把财货藏于己身，因为个人自己的基本需要不大，个人效用函数里个人消费量的边际效用下降迅速，个人很容易就几乎可以达到完全满足 (satiation)，而把财货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分享更为重要。

最后，个人效用函数也应当取决于不仅是现时，也包括将来的个人与其他人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量向量(或其他人的现时与将来的效用函数值)。而在个人效用函数里，现时与将来的个人消费量，也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个人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所需要作出的决定就是：假如五年后能多吃一碗饭，值不值得今天少吃半碗饭？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时间优先选择率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的考虑。

所以个人效用函数也可以再写成：

$U_0 = F(X_{01}, X_{02}, \dots, X_{0T}; U_{11}, U_{12}, \dots; U_{21}, \dots, U_{nT})$ ，其中 X_{0t} 个人自己与家人在 t 时期的商品与服务消费量的向量； U_{it} 个人在 t 时期的效用函数值； T 是 0 个人计画时期的总上限；同时 0 个人的效用函数值，也是独立于数标 i 的。假如个人效用函数是有这种形式，那末个人在考虑作出决定时，就需要考量个人与其他人的利益，也需要平衡短期与长期的利益，这样就不会作出太自私和太短线的决定。

3.3 集体福利与社会安全保障

大道之行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重点在开头的这个「使」字，就是说：这些目标最终都是执政者(与社会)的责任。「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说：所有的弱势社群，所有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民，都能获得应有的生活照顾与保障；国家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壮有所用」就是说：所有成年人都能对社会作出贡献，都会有有意义的工作机会；执政者的责任，就是要维持全民就业 (full employment)。与此同时，「男有分，女有归」也就是说：所有人民都能积极参与社会，都能有一个夫妻互相关顾的家庭，而执政者也有促进成年男女成家的责任。这样一来，所有人民的基本需要都能够获得满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目标亦都符合现代的社会公义。

3.4 小结

在经济领域推广儒家的王道文化，就是要改变人民的个人效用函数，希望他们不光是考虑自己或家人的利益，也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也希望他们不要太斤斤计较物质的消费与享受，不要太偏重短期的得失，而也要考虑长远的利益，也要关注到还未出生的世代的持续生存。个人效用函数是内在的，对约束个人的行为，比外部的守则与法律更为有效。

近年来，从个人到社会，价值观开始朝着唯己化，功利化与势利化的方向演变；只求利己，不怕损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不但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增加的主要原因。这个趋向，也表示在个人效用函数里，已经没有其他人的因素。可见得个人主义与唯己化的发展，是和王道文化背道而驰的。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他的书中⁶，也曾提出个人对其他人的福祉应有的关注。

4. 王道文化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机制具有的优点，就是能够让整体经济达到最高的效率。但它也必须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例如具有真正的公平竞争性，信息要正确实时，市场买卖双方信息都要对称，参与者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市场，生产与消费都没有外部效应等等，才能达到经济效率最高的结果。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他 1894 年上李鸿章的万言书里，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构想，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整体经济达到最高效率的标准。但即使整个经济体

⁶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s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里完全没有外部效应，市场机制本身也并不能确保这些特定条件能够自动与及时满足。因此，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应当有反垄断法与公平竞争法。

4.1 品牌与品质

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无名性 (anonymity)；买方与卖方通常都是短暂地一次性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欺诈的行为。「讲信修睦」就是讲求信用，培养和谐；就是要卖方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假使卖方能够考虑到它本身的长期利益，就会希望与买方有重复的、多次性的交易，也就自然不会采取欺诈的手段，卖方也会有意愿去建立自己的品牌；既然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就会尽力去保护它，不会做任何会损坏自己品牌、自己声誉的事。

在这一方面，政府能扮演什么角色？政府可以利用它独有的公信力，提供检验与证明的服务，和严禁假冒，并保护品牌拥有者的智慧财产权。这些都是一般商业机构做不到或不适宜做的事。

品质自古以来也是社会大众所重视的问题，在《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提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则就说明品质与货真价实的重要性。由中国大陆的黑心奶粉事件与台湾的塑化剂事件，都可以看到当品质出事时，对于人民健康，对于社会经济，对于政府的公信力，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而政府的法规往往由于制定宽松或是不合时宜，并没有发生实际效用。在这种事件中，需要的是有公信力的检验与证明，一般只能靠政府来提供。但在政府努力之余，还是必须靠教化的方式来改变价值观，提升道德观念，从而减少这类违法的行为。

4.2 垄断市场的诱惑

对一个参与市场的供应者来说，把它利润极大化的最佳策略，并不一定是与其它供应者(公平)竞争，而是试图把市场垄断起来，或是勾结其它的供应者，或分割市场，或联手抬价，以减少竞争，增加利润。但操纵或垄断市场的行为，绝对是违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

垄断一词曾出现在《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其原意在于有一人企图操纵市场而从中获益，虽与现今社会通用的垄断一词，意义有所不同，但可见孟子对于左右市场而从中获利的人士，相当不以为然，且认为应当对这样的行为以税法来规范。回到现今的角度，在全球化趋势之下，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莫不寻求各种方式以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包括独占或垄断市场的行为，以及其它不公平的竞争手段。所以政府必须有反垄断法与公平竞争法，严格监管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维持市场的开放性与竞争性，让市场机制能发挥它的作用。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支持市场公平竞争（「反托拉斯」）的国家，其「修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乃于公元 1890 年立法，其后于 1914 年再制定「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其中定义了托拉斯行为是任何以契约、信托或其他方式所形成之联合或共谋行为，具有限制或损害州际或与外国间之贸易与商业者之权益。反托拉斯法最主要的目的，在维持市场的公开与公平竞争机制。美国的反托拉斯法重点在于吓阻的功能，因此其刑事上的处罚极重，且有三倍裁罚的规定。

反托拉斯法相对于台湾的法例则为「公平交易法」，台湾公平交易法乃参考国外之经济法而定的，如美国之反托拉斯法、英国之独占及限制行为法、西德之竞争限制禁止法、日本之独占禁止法等。台湾的公平交易法于 1992 年开始实施，此法规范产业界滥用独占地位、利用结合及联合手段垄断市场、以不公平的竞争手段维持或增加市场占有率及利润等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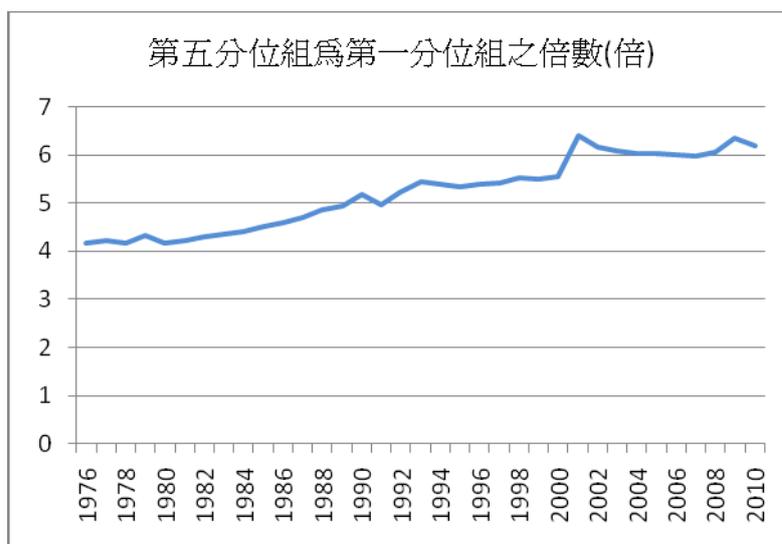
政府的介入，对节制意图操纵或垄断市场的行为，可能有一定的成效，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王道文化的精神，透过教育，透过移风换俗，改变每个人的社会基本价值，改变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从而将这样的行为降至最少，以维持社会的长期和谐。

4.3 收入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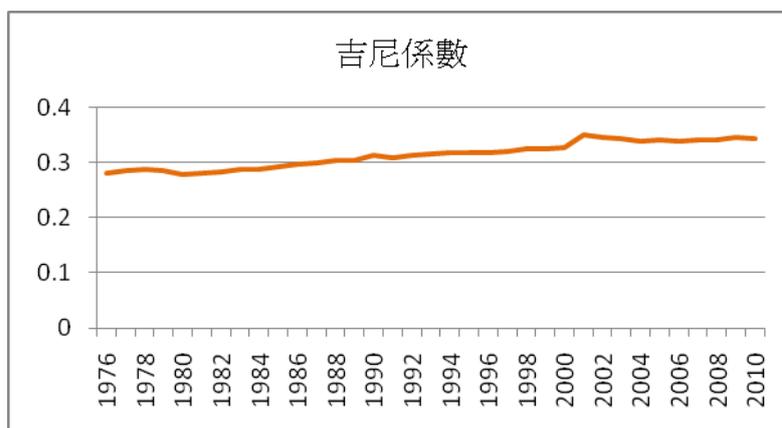
一个社会的个人薪酬差别，是应当反映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差别。环顾世界各国，在典型的企业中，最高与最低薪酬的相比，有极大的差异。在美国，是100对1；在欧洲，是低于50对1；在日本，是不超过10对1。这样大的差异，不可能只是反映高低薪酬员工对社会贡献的差别，而也是反映不同社会的不同的文化与风气。在一个奉行王道文化的社会里，最高与最低薪酬的差别，是不应当太大的。

此外《论语·季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则更进一步点出社会所得分配的核心问题。人民担忧的并不一定是贫困本身，而是分配的不均。图三显示台湾所得分配第五分位族群所得相对于第一分位族群所得的倍数，可以发现近40年来，台湾家庭所得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最高20%的家庭所得相对最低20%的家庭所得，从1976年的4倍多，逐渐增加到21世纪10年代的超过6倍。图四显示台湾的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也呈现同样的趋势。因此政府必须更加审慎地运用各种社会福利，如透过发放低收入户生活辅助、中低收入户老人生活津贴、

老农福利津贴、残障生活补助、灾害急难救助，以及各项社会保险保费补助等政府转移支付来降低所得的不均度。从更长远的考量，政府应当加强对教育与科技研发的投资，加速产业升级与多元化，加深再就业培训的力度，才能面对全球化与资讯通讯技术进步产生的冲击，使人民能有充分就业的机会，从而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图三



图四

4.4 协调合作创造双赢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里，各个参与者都是独立运作，不能缔造双赢，达到正和 (positive-sum) 的结果。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可以有很多双赢的机会。例如一个房东和一个企业租客，他们彼此的利益看起来很不一致。房东希望长期的高租金，但也不想高到租不出去。企业租客当然希望租金较低，也希望能有一个长期的租约，但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企业刚刚开始稳定的时候，房东就大幅度提高租金，逼得它只好结业。

假如房东和企业租客都能够看远一点，房东给租客一个长期的租约，租金分两部分：基本租金是固定的 (或是与通货膨胀率挂钩)，激励租金是可变的，与企业的营业总额 (超过一个预先设定的门槛以上) 挂钩，例如百分之五。这样一来，双方的利益都有保障，房东可以分享企业的成功，而企业租客也可以安心地长期发展。

要达到这种双赢的结果，双方就不能各自只考虑单方面的短期利益，也需要考虑彼此的长期利益。往往双方必须要协调 (coordination) 与合作 (co-operation)，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5.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一个奉行王道文化的社会，不会让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日本人民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与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与海啸后的表现，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大地震(和海啸)后，灾区社会秩序井然，处处可以看到日本人民在灾后的应变措施以及人民彼此互相关怀，互相以全体民众利益为优先的行为，而在其它灾后城市普遍发生的劫掠事件，完全没有发生在神户和福岛。这就是不让个人利

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例子。

反之，美国国会议员在2011年商议应否提高美国国债上限时的表现，是一个很坏的例子。所有美国国会议员都知道，美国国债的上限，是非提高不可。但大家都希望其他的议员投赞成票，让自己可以有空间投反对票，从而帮助自己再竞选连任。结果是议案迟迟不能通过，连累到美国国债评级被下调。这就是美国国会议员让个人的利益凌驾于集体与国家利益之上的坏例子。其实，美国国会议员当时是应当全体一致通过提高美国国债的上限。这样既能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也避免了让这整件事变成选举的议题。

6. 结语

王道是儒家用之以为治国平天下的基准，以教化人民为前提。这样的治国方式是必须由执政者自身做起。《颜渊十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就是说：上梁正下梁就不会歪的意思。因此当国家在执政者带领之下，能以民为本，使人民温饱之余，思考如何教化人民，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并辅以适当的法律，使得人民不再以个人自身利益为优先考量，而考量他人以及整体并较为长远的利益，这乃是整个王道文化的精神所在。

假如一个经济体中完全没有外部性，在完善竞争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可以使整体经济达到最高的效率（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定理）。可是当从生产到消费都有外部性，同时完善竞争的条件也未能满足时，单靠市场机制自动运作，就不能保证整体经济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率。因此在现今的经济体系中，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如同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必须手携手合作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而达到最高的效率，在实现超富足的物质经济水平之前，是迈向大同世界的必须。

推行王道文化，首先需要移风换俗，需要从改变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做起，改变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做起；要每一个人除了照顾自己的利益之外，也会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与感受。光是靠立法与执法，不足以阻止不道德、不公平或不合法以及短线行为的发生，也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唯有改善、重整与重建道德价值，培养社会大众的公德心，改变个人的效用函数，才能将种种叛道、亏德、不法以及追求短线利益之行为，消弭于无形，才能维持社会的长期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经济思想研究，中华书局。

[2] Plato, *The Republic*。

[3]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